

20世纪

中国人生观论争

■ 张 庆 著

图书馆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世纪

中国人生观论争

王 康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B821
89

20世纪中国人生观论争

110731
16011

天著

● 广东高

版社

68X36/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人生观论争 / 张庆著. — 广州: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8

ISBN 7-5361-2485-6

I. 20… II. 张… III. 人生观 - 研究 - 中国 - 现代
IV. B 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3358 号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天河林和西横路

邮编: 510075 电话: 83792953

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4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定价: 20.00 元

导 言

20 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中国人民在这 100 年间，实现了三次伟大的社会巨变。

第一次是辛亥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领导这次革命的公认领袖是孙中山，他创立的三民主义成了这次社会变革的指导思想。三民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第二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它消灭了封建地主阶级，彻底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消灭了官僚资产阶级，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使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领导这次革命的公认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其代表是毛泽东。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创立的毛泽东思想是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第三次是改革开放，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它改革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体制，完善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领导这次革命的公认领袖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其代表是邓小平。以邓小平著作为代表的邓小平理论成了这次革命的指导思想。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20 世纪中国历次革命的终极原因都是经济的，即社会生产关系成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社会革命的时期就到来了。然而社会制度的变革则是从政治制度开始的。通过社会革命，首先变革旧政治制度为新政治制度，然后变革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生产关系，再进而借助新的政治制度和生产关系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的社会意识，最终达到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目的。社会革命是先进阶级、先进政党的自觉行动，实行革命前要形成革命的意识，即正确反映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的意识；革命开始后，要有推进革命、革命到底的意识。总之，革命的全过程均有进步的世界观、人生观、政治观指导。如孙中山的进化论的世界观、民主主义人生观以及三民主义政治观，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和新民主主义及社会主义革命的政治观，邓小平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科学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及改革开放的政治观。

这些情形表明，不同阶级有不同的人生观。先进阶级和腐朽阶级的人生观不仅有别，而且对立、对抗，谁优谁劣，孰胜孰败，论争不可避免。同一阶级的不同集团有不同的人生观，有时会将同一阶级同种人生观的差别视为不同阶级甚至对抗阶级的人生观，谁胜谁败，论争亦不可避免。人生观论争是社会革命进程中不可缺少的思想理论斗争。20 世纪的中国是革命的中国，人生观论争贯穿始终就不足为怪了。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革命政权却被复辟派袁世凯篡夺了，所以，封建势力仍十分巨大；另一方面，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了中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的机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举起了民主、科学两大旗帜，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以反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意识。以此为背景开展的东西文化及其关系的争论中就包含了复辟论者辜鸿铭及其同情者杜亚泉与资产阶级民主派陈独秀、李大钊之间的人生观论争。与此同时，资产阶级内的激

进派和温和派之间也开展了两次规模较小的人生观论争，一次是毛泽东等人围绕婚姻自由开展的人生观论争，一次是围绕自杀问题开展的人生观论争。

毛泽东有句名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以及巴黎和会屈辱中国的契机，“五四”新文化运动演变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由此成为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折点。一方面，一批考察战后欧洲回国的资产阶级人士如梁启超、张君勱等人宣扬西洋文明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大战表明了科学万能论的破产，认为西洋的出路在学习中国固有之文明即孔子之道。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西化派如胡适等仍坚持向西走，彻底否认孔子之道。因此，东西文化及其关系论争中的人生观论争又有了重新开战的必要。此时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瞿秋白等迅速向共产主义转变，资产阶级西化派分化出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和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有1923年开展科学人生观与玄学人生观之争。它一方面是资产阶级新儒家的人生观与资产阶级西方化的人生观之争，如梁启超、梁漱溟、张君勱与胡适、吴稚晖的人生观之争，一方面又是陈独秀、瞿秋白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人生观与新儒家人生观、资产阶级西化派人生观之争。从而使“五四”运动前的资产阶级内部的人生观之争发展为20世纪20年代的资产阶级的人生观与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的人生观之争，使东西文化及其关系中的人生观之争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并促进了共产主义人生观的宣传、普及。

“五四”运动之后，借十月革命之机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与从西方介绍到中国来的资产阶级哲学如实用主义、生命哲学等，作为两个潮流平行地发展着。到了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已风靡中国，其力量之大，使学者们公认

它是一切学问的基础，不论是研究社会学、经济学、考古学，或从事文艺理论研究，都在马克思主义中看到了新的曙光，许多旧的文艺家和研究家都转到马克思主义方面来，如鲁迅先生抛弃了人道主义，李石岑撇开了尼采；一些旧学者，也不能不拭目一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不得不向《资本论》求助；还产生了一批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宣传家，如艾思奇。30年代中期，艾思奇针对胡适、张君勱借回顾20年代科学与玄学论战而进行的文字辩驳，提出人生观问题的中心是主观性和自由意志问题，论证了这些问题何以成为人生观的中心点，阐明了它们的科学内涵，同时对《东方杂志》上殷福与蒋径三之间自由意志的争论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一批非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们在民族危机和阶级斗争的刺激下纷纷创立自己的哲学体系。尤其是作为中国资产阶级思潮之一的现代新儒家也参与创立体系的活动，如熊十力创立新唯识论，贺麟创立新心学；而这一思潮的主角冯友兰大体上承接宋明道学中的程朱理学一派道统，创立了自号为新理学的庞大的严密的哲学体系。冯友兰新理学哲学体系的代表作是抗日战争时期出版的《贞元六书》，其中1943年出版的《新原人》是专讲现代新儒家的人生哲学的。在《贞元六书》出版过程中，冯友兰的新理学即遇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者左右两方面的批评。前者有杜国庠、胡绳、陈家康等，他们从个别观点到总的评价上对新理学作了彻底的否定；后者有朱光潜、孙雄曾等，他们站在冯友兰的同一立场上，接受冯友兰的立场，仅指出其体系中的破绽。对于冯友兰新理学的左右两方面的批评一直延续到《贞元六书》出齐之后。冯友兰对于来自左的方面的批评一概不理，也不答辩，他认为彼此间没有共同语言。

由上可知，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中国思想界大大小小的的人生观论争计有七次。这些人生观论争的最显著的共同特征是论

争参与者及论争内容的阶级性。东西文化论争中的人生观论争是封建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之间的论争，科学与玄学论争在陈独秀、瞿秋白参战前是资产阶级内部两派的论争，而 30 年代艾思奇与胡适、张君勱等人的论争以及 40 年代围绕新理学进行的人生观论争则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人生观理论的论争。

20 世纪的下半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50 年。这半个世纪又可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共 30 年，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后一段，从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 20 世纪末，共 20 年，中国人民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20 世纪下半叶前一段的 30 年，进行过三次大的人生观论争，后一段进行过两次大的人生观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的前期，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正确指导下，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从 1957 年开始，毛泽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国际上，他认为赫鲁晓夫上台就是修正主义上台，也就是资产阶级上台；国内，他认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步步升级，并引入党内，引入党中央的领导层。当 1958 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表现出超越中国实际的“左”倾错误时，当彭德怀等人对这些“左”倾错误的言行提出实质正确的批评时，毛泽东就把彭德怀等人的正确批评，把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同观点、意见，把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方法都视为党内的阶级斗争，视为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看成是无产阶级立场和资产阶级立场，马克思主义世界

观、人生观与反马克思主义的经验主义世界观、人生观的斗争。于是在1959年的党的庐山会议上，开展了马克思主义人生观和“经验主义人生观”的斗争。

1964年由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发起、组织、引导的对冯定《共产主义人生观》一书的批评，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尤其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有直接关系。1962年，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社会主义时期总路线，认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1964年开展了农村四清运动，认为1/3的基层政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中。阶级斗争的理论与实践必然要反映到理论战线上来。当时党中央抓意识形态的领导入到处寻找斗争对象，而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等著作被他们视为否认阶级斗争为纲。于是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就以冯定及其人生观理论为批判对象而表现出来了。

毛泽东认为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四清运动还不能保证党内阶级斗争的胜利，于是，在无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指导下，他亲自动、组织了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古往今来，阶级斗争都是从三方面进行的：经济上、政治上和思想上。“文化大革命”也是如此。“文化大革命”由始至终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上的阶级斗争，有真的，有假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有党内的，有党外的。其中，以遇罗克等人为代表的出身论与谭力夫为代表的血统论的斗争，就是一场党外青年进行的虚假的阶级斗争，而遇罗克等人对谭力夫等人的思想斗争观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然而，无论是遇罗克及其出身论还是谭力夫及其血统论都被林彪、“四人帮”定性为敌我矛盾给镇压了。

50年代庐山会议上的人生观之争，60年代对冯定人生哲学的批判，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对遇罗克出身论的镇压，有如下几个特征：（1）在阶级斗争、防修反修思想指导下，混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共产党人之间或人民群众中不同观点、方法的差别定性为对抗性的阶级斗争，把认识问题、学术问题当作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使阶级斗争扩大化。（2）口头上说思想问题、是非问题是要用民主的方法、讨论的方法、说服的方法去解决，实践中却把思想当行动，用行政的方法甚至用专政的方法镇压与领导层意思、观点不同的人 and 事。（3）人生观问题的争论，仅仅是单向的批判，领导层的观点代表真理，只准被批判者认错，不准被批判者申辩，更不允许被批判者反驳，不仅言论自由没有了，甚至思想自由也被否定了。（4）百花谢了，争鸣停了，科学受到了压制，学术受到了摧残，文明受到了迫害，思想受到了窒息。

80年代进行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人生意义之争，由于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林彪“四人帮”反革命统治的覆灭，邓小平改革开放蓝图的实施，真正做到了不同思想观点间平心静气地沟通，分析问题，说理规劝，使这次论争发展为20世纪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影响最深远、历史意义最大的人生观之争。

1997年《人生的“意义”在哪里？》的讨论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讨论的继续。

20世纪中国12次人生观论争（解放前7次，解放后5次）给我们启迪良多。（1）社会变革必然引起人们意识形态的转变，产生新的人生观或人生观理论即人生哲学，新旧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差异乃至对立是不可避免的。21世纪，我国的改革开放国策继续执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继续进行，改革仍然是一场革命，社会体制的巨变必然导致人生观、人生哲学的巨变，所以，

21 世纪中国仍然会有人生观论争。(2) 20 世纪的中国人生观论争有阶级之间的, 还有同一阶级内部的。21 世纪, 港澳台仍然有阶级斗争, 大陆仍然有阶级斗争, 不同阶级的人生观之争, 同一人生观不同派别、方法的人生观之争, 仍然是人生观论争的基本类型。(3) 人生观论争属于思想意识范畴, 无论不同人生观之间的, 还是同一人生观内部的论争, 均只能用说理的方法、讨论的方式, 互相沟通, 明晰是非, 决不能用行政的方法、压服的方式、专政的办法。只有如此, 才能促进科学的昌明、社会的进步和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

目 录

导言	(1)
第一章 “五四”时期三次人生观论争	(1)
一、东西文化辩论中的人生观论争	(4)
二、赵女士抗婚自杀引发的人生观论争	(18)
三、围绕林德杨事件开展的人生观论争	(31)
第二章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42)
一、论战过程	(42)
二、论战导因	(47)
三、论战基因	(59)
四、第二阶段	(67)
五、新的起点	(83)
六、论战经验	(95)
第三章 30年代的两次人生观论争	(97)
一、胡适、张君勱同艾思奇之间	(97)
二、意志自由之争	(122)
第四章 围绕新理学的人生观论争	(131)
一、冯友兰的宇宙观和人生观	(132)
二、立场相同和立场不同的人对冯友兰人生哲学的 批评	(146)
第五章 经验主义人生观还是马克思主义人生观?	(161)
一、论争次第	(161)

二、常委会上面对面的辩论·····	(169)
三、中央全会上面对面的辩论·····	(177)
四、谪居吴家花园时的辩论·····	(182)
五、历史颠倒过来·····	(187)
第六章 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及对它的批判 ·····	(190)
一、批判始末·····	(191)
二、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	(195)
三、《红旗》、《新建设》组织文章批判冯定的人生哲学·····	(207)
四、几点随想·····	(224)
第七章 “出身论”与“血统论”之争 ·····	(226)
一、远由近因·····	(226)
二、出版前后·····	(232)
三、三轮辩驳·····	(235)
四、冤案平反·····	(250)
第八章 “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之争 ·····	(252)
一、事出有因·····	(252)
二、发展进程·····	(254)
三、讨论焦点·····	(263)
四、笔者意见·····	(275)
五、民主总结·····	(294)
第九章、讨论“人生的‘意思’在哪里？” ·····	(295)
一、讨论情况·····	(295)
二、人生“意思”·····	(297)
三、编辑总结·····	(299)
四、几点余论·····	(300)

第一章 “五四”时期三次人生观论争

“五四”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是一次文化运动，也是一次政治运动，是由文化运动演变为政治运动的。1915年9月，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一年后改为《新青年》），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

新文化运动的发起有着深刻的社会根基。国内的根基是第一位的，也有国际的原因。

国内根基。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国家间的非正义战争。战争期间，只有日本、美国的在华势力不断扩张，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彼此交战，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我国民族资本主义较迅速地发展起来。1914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新建厂矿379个，平均每年增加63个。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民族资产阶级和现代无产阶级壮大起来。1919年，我国产业工人已达200万人左右。随着民族资本主义、民族资产阶级的壮大，资本主义教育也发展起来。1915年与1905年相比，学校数目就由不足6万所增至近13万所，增加一倍多；学生由164万人发展到430万人，增加了1.6倍多。资本主义教育培养出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改造了一批旧知识分子，产生了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这批民主主义者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欢迎并迅速接受马克思主义，开始由激进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逐步成为中国现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另一方面，辛亥革命

虽然推翻了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代表——清皇朝的政治统治，中华民国的成立却未给中国人民带来预期的民族独立、民主科学与社会进步。封建残余活动猖獗，袁世凯一度复辟帝制，张勋曾拥宣统皇帝复辟，尊孔读经的复古再次泛起。这样，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斗争反映到思想领域，遂掀起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这是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必然要产生的根据。

国际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尽管有一些先进的中国人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缺陷，但大多数中国人却向往欧美和日本的资本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的弊病得到更全面、深刻的暴露。许多中国人开始认真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西方文明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文明，它是否是中国人唯一的学习榜样？许多知识分子坚持要全盘接受这一文明；部分知识分子在由激进民主主义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时期则坚持要接受西方文明中的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的影响使他们更加坚持接受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及其知识分子既批判西方文明也针对马克思主义。在思想领域，除了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冲突之外，又加添了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使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呈现出矛盾复杂的状态。不过，这时的矛盾以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为主，因为我国最先进的知识分子这时也只处在共产主义的转变过程中，民主主义的成分依然保持着。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民主与科学。新文化运动早期，民主主要指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新文化运动后期即十月革命以后，向共产主义转变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已经知道了社会主义民主以及其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差别，知道了无产阶级专政，使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打上了新的印记。至于科学，在新文化运动早期，它专指资本主义文化尤其是自然科学；而在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向共产主义转变中的激进民主主义者已承认并接

受科学共产主义了。新文化运动中民主与科学的口号直指封建主义的政治、文化、思想、道德、习惯、世界观、人生观。新文化运动中新人生观与封建主义人生观的论争成为不可避免。

1919年1月1日,《新潮》一卷一号发表了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一文。傅斯年说,文章标题所以叫人生问题发端,是想通过这篇文章提议大家讨论、共同理会人生观问题。他指出所以要讨论人生观问题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每逢与人辩论,总是各说各的,总有打不清的官司,究其“原动力:第一,是思想式的不同。第二,是人生观念的不同。这两件既然决然不同,一切事项,都没接近的机缘了”^①。二是,只有讨论人生观这个根本问题,才有共同判断“文学的革命”、“伦理的革命”、“社会的革命”的共同标准,否则,这些革命“虽然是时势所迫,不能自己;然而竟有许多人不肯过来领会的”^②。可见,当时讨论人生观并非纯学术之争,乃是为文学的、伦理的、社会的革命打下思想基础。

傅斯年认为,西洋人生观有两大潮流,一是生物学派的,一是实际主义的,它们的共同点是拿人生解决人生,是现在思想潮流的趋势。

傅斯年还认为,“中国历来是个乱国,乱国的人,不容觉悟出人生真义。”^③他认为,中国有四种人生观,都属应批判之列。一种是达生观,以庄周为代表;第二种是出世观,也有两种,一是肉体的出世观,如中国历史上的隐士,一是精神的出世观,如佛教的厌世主义;第三种是物质主义,是一种只想快乐、只知纵淫欲的人生观;第四种是遗传的伦理观,主张人为道德而生,为

① 傅斯年:《人生问题发端》,《新潮》1卷1号,1919。

② 《傅斯年学术散论》,2页,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③ 《傅斯年学术散论》,8页,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